

花言峭语

狄仁杰、高罗佩和水世芳

在新版的《大唐狄公案》第四集的最后，狄仁杰说出了他发现真凶的一个重要线索。太子在自己的文章里，写了自己的两性观：“唯女人与小人难养也，此言差矣，夫女子纵然骄纵，男子待之，将顺其美，匡救其恶，海涵其性，称为君子乎。”虽有局限，但在当时，已经非常进步。但太子的老师给出的朱评却是：“胡言乱语，阴阳不分。”

狄仁杰就是根据这一点，开始有了自己的怀疑，并且一步步坐实。他说出了这四集里，也是这部剧里最重要的话：你对皇后的恨，不亚于长孙卿，他的恨，还有立场的牵绊，你死我亡的顾忌。仅仅因为她是女子，你的恨，比长孙卿更甚。

这部剧有非常紧贴时代的两性观。不但编剧京瑜是女性，也有众多女演员出演，钟楚曦扮演的武则天，王丽坤扮演的曹安，陈都灵扮演的秋月，等等，甚至连原著故事里，狄仁杰身边由土匪感化而来的武官马荣，在这部剧里也变成了女性，由凌孜出演。

这种两性观，也建立在原著的观念基础上。原著作者高罗佩，一个出生在荷兰的精神中国人，在他于1940到1960年代创作的《大唐狄公

案》里，女性个个性格鲜明，美丽丰饶，拥有传奇的身世和故事，而高罗佩则对她们在婚姻中的遭遇，更是给出了极大的关注。

他为什么会写出这么多美好的中国古代女性？他对女性的态度和感情建立在什么认识基础上？答案很可能是，水世芳，他的妻子水世芳。

水世芳出生在一个富贵之家。祖籍江苏阜宁，生长在北平，父亲水钧韶是外交官，当年乘车去圣彼得堡上任时，带了四十五节车厢的随从和三四十个厨子，后来还担任过京奉铁路局局长和天津市市长。十个兄弟姐妹中，水世芳排行第八，她家家教极严，和父亲也难得一见，偶然传见，父女间的对话仅仅限于：“一切都好吧？”“都好。”

念的是知名女中，肄业于西南联大的前身长沙临时大学，后来在齐鲁大学修完历史社会学学位，经立法委员叶秋原介绍，进入设在重庆的荷兰驻华大使馆工作，在那里，她认识了担任使馆秘书的高罗佩，他们一见钟情，迅速开始恋爱，却不愿声张，叶秋原向高罗佩询问水世芳的工作情况时，高罗佩还故意做出不大高兴的样子

说，她总是迟到早退，后来，所有人才知道，那只是烟雾弹。

临到高罗佩提起婚姻大事，她却提出，要高罗佩同时娶她的妹妹作二房，对高罗佩来说，这可意味着重婚罪，他愁眉不展，向他在重庆结识的朋友蒲乐道——另一个把自己当做中国人的老外求救，听到前因后果，蒲乐道说：“你的爱人必定是个心地温和的少女。她很爱她的妹妹，所以不肯和她分开。只要你答应她一生让妹妹跟你们同住，那不是很好吗？”高罗佩欣然听从，一个月后，高罗佩和水世芳在重庆结婚。

婚后的生活并非康庄大道。多年后，水世芳的儿子，仍惊讶于她在结婚离家后表现出的韧性和独立。外交官三年一调，他们一九四三年结婚，一九四五年就去了海牙，匆忙间，水世芳只带了一个小包，从此，美国、东京、印度、黎巴嫩、马来亚，一路奔波下去。最难是印度，气候难捱，周围没有一个中国人；在黎巴嫩时，正逢战乱，四下里流弹穿梭，她带着三岁的孩子，在山顶上避难；在海牙，前后就搬过十次家。水世芳如此感叹：“生活不容易啊！”

二战结束后，高罗佩开始写《大唐狄公案》，声名日隆，连业余时间也全遭占用。富贵之家的训练，这个时候显示出了它的不凡之处，失范的生活中，水世芳仍旧保持她的风范。《大唐狄公案》在日本出版时，正是日本人热爱裸体图像的时候，书的封面必须是裸女，多年后，水世芳向学者出示那个版本，总是把封面折起来。

由此，人们理解了《大唐狄公案》中的那些奇女子，不论大家闺秀、小家碧玉或者风尘女子，总是很有教养，却又情感丰沛。

1967年，高罗佩在海牙病逝，水世芳从此独居西班牙南部。晚年的她，面对来访者，虽然穿洋装披披肩，却还是保持着三十年代说话的方式和语调。

她最怀念的是在重庆的生活，结“天风琴社”，和徐悲鸿、于右任、冯玉祥来往，那是她最好的时光。也有人鼓励她写回忆录，她觉得过去应该过去，没有要写作的意愿。后世那些纪念或者研究高罗佩的文字，都出于别人之手。

韩松落
作家

钱眼识人

有人赞美有人则不

话题上的新剧《猎冰》还真是实打实的穷剧组，据导演高群书在在微博上透露投资也就四千万，间接回应了被资本操控卡司的传闻。剧呢，我也追到了十来集，整体感受其实还不错，主要来自于男主角张颂文的表演，用“一己之力”这个词丝毫不为过。当时，他刚刚演完《风中有朵雨做的云》、《革命者》等大银幕片，在业内的口碑是起来的，但是在普通观众心中尚未形成认知。那时候，《狂飙》并未出现。现在，有些观众因为姚安娜的出现，“迁怒”张颂文，以偏概全认为他演烂剧，收大红包，跌到谷底，都是违背客观时间线的虚假认知。敢讲，没有《狂飙》这部剧，张颂文一样有机会冒出头。

他塑造的“制毒师”黄宗伟立体感很强，从某个角度来说超过高启强的。角色的父亲出家，姑姑们削发为尼，全家族就剩他一个男丁在外打拼，因为他背负着振兴家族，光宗耀祖的“使命感”，所以当他的妻子生出三胞胎男孩时，他大言不惭地联想到所有传统意义上男性相关的成功领域，可见他心中的成功梦有多野有多狂。基于这个底色，就不难理解张颂文成为一个自信、娴熟的交响乐指挥手，不断在表

演中增加脱离现实生活一点点的戏剧化细节，就像暗夜中隐隐约约的歌剧腔唱段，听着迷离又诱人。比如他迷信，逃命之前一定要带着阿龙拜祖宗；大儿子难得开口喊爸爸，他不要回头，也不允许老婆哭，他忍着眼泪，面部抽动，也要恪守神秘的求生法则。

他嚣张，不知道是不是从港片学来“六亲不认”的动作，边走边打响指；比如他突发奇想炸掉面馆，帮助女服务员阿美离开咸湿老板；比如他虚荣，喜欢毒贩叫他教授，说自己就是教化学的……在一段宣传花絮中，可以看出张颂文对每一场戏是非常认真、讲究的。他会问现场的专业指导，要不要佩戴手表，他判断是不能戴的，并且跟高群书达成共识，黄宗伟在制毒时是内心是喜悦的，自信的，进入无我境界，外化到身体语言，就是流畅、优雅的，拿着试管的时候就像小心呵护一朵娇艳的鲜花。在剧中，能制毒居然是黄宗伟一生中最高得意的天赋、技能，也是他可以周旋于各个凶残毒贩之间的筹码和底牌。制毒那一瞬间，就是他人生的高光时刻，无需在众人面前狂飙，他已然在独处时尽情发飙了。一个演员，依照自己的

生活经验、学习能力和想象力为很可能薄弱几页纸的剧本赋予那么多细节，可观可感又可叹。当然，不管张颂文的表演有多少有设计感的细节，但是始终有一条钢线将他与现实生活栓紧，他的出发点是主动、现实、功利的，是一个在保守的乡土环境中渴望获得尊重，光耀门楣的“凤凰男”的黑色奋斗史，所有这些都是现实主义的本土骨架。因此可以说，不能在黄宗伟身上寄托起飞的浪漫主义寄托，他一出现，就是狼的狡黠、贪婪与冷硬。张颂文赋予的细节，就是在非常直接的钢丝上绕上几圈金线。

对于《猎冰》，张颂文在微博中说的，喜欢它，不喜欢它，都是能找到理由，是非常自然的。最可怕的不是出现批评的素材和对象，最可怕的是有一天我们只有一种风格、套路和审美，从而只剩下空洞的赞美，夸夸裂，夸催泪，夸精致。从这个角度来说，有人喜欢有人则不，就是最正常也最应该去保护的观影生态，闭着眼睛尬吹，谁不会呢。

钱德勒
媒体人

早闻狄声

观众为什么同情姚玉玲？

《南来北往》有个典型的“莫欺少年穷”的结局：牛大力在和女友外出时偶遇昔日“白月光”姚玉玲，对方不再是美貌阔绰的富太太，而成了街头摆摊的烧烤小贩。两人相顾无言，姚玉玲仓皇避开，牛大力则留下当年的戒指，满心伤感。

不少观众对这样的结局愤愤然，有关“姚玉玲结局”的话题甚至迅速冲上了热搜。在大部分观众眼中，姚玉玲固然是个爱慕虚荣的悲剧人物，但这个“男子携新欢偶遇落魄前女友”的戏码，着实俗套。用今天的眼光看，姚玉玲和牛大力分手的原因，本质在于两人感情基础薄弱，认知、审美和趣味又大相径庭。一个追求体面，为了美宁愿用仅剩的粮票换布票；一个满心讨好，却不忘规劝对方“能省则省”……这样的两个人，从一开始就注定走不长远。更何况，多年后能在烧烤摊自力更生，未尝不是姚玉玲对虚荣岁月的反省。电视剧非要上演“打脸白月光”的戏码，反而有一种左右互搏的拧巴之感：这边强调“追求物质没有好下场”，那边又明晃晃地点出“有钱才有可能娇妻在侧”。

当然，也不是没有观众感慨这个结局足够解气，但互联网上的激烈讨论已然说明，今天的观众对人物的看法不再是“非黑即白”。他们想看有血有肉的好人，也想看到立体复杂的坏人，角色最好是“五彩斑斓的黑”，而不是“千篇一律的白”。因此，创作者最好放下“教你做人”的架子，让观众自己悟，远胜于直白地说。

就好像同样是写有虚荣心的青年女性，《三十而已》的王漫妮会沉溺在温柔的陷阱，也会在犯错之后断绝糟糕的情感关系。从《欢乐颂》开篇就不断被嘲讽虚荣的樊胜美，在一次次失败中逐渐放下“嫁个好男人”的愿望，开始脚踏实地。《上海女子图鉴》中，罗海燕一路跌跌撞撞、力争上游，被人骗过、嫌弃过，最终在岁月的磋磨里收获了自己的成长。《漫长的季节》里，丽茹与龚彪的感情虽然始于欺骗，但观众能够清晰地看到，在相伴的时光里，她如何苦苦为家庭付出，又为何最终无奈感慨，“这辈子没咋过明白”。

是的，这些想要过上更好生活的女性角色，本质上都不是什么真正的反派，她们不过是曾经没有“活明白”，用过错误的方法，有过短暂的迷失，也都为此付出了相应的代价。今天的观众，不再想看到粗暴的惩罚和审判，而期待更细腻的观察、更真实的理解——追求美好不是错，人生也不会只有一种结局。

常原秋
媒体人

情人看剑

影视圈里的时尚圈

同样是杜鹃，王家卫拍出来是天仙，时尚杂志拍出来可能就让人一言难尽。

前几天《繁花》家族齐聚上海某商业活动，剧迷粉丝在现场人群中寻找各自喜欢的玲子、梅萍、强总、葛老师，没想到雪芝也在。演员身份的杜鹃依然有一种人淡如菊式的清冷，就像《繁花》里她出现在曹家渡的洪顺兴，闹哄哄的人群马上闪开一条道，极写其艳光凛然。据说王家卫找她是因为“冰美人”气质，时尚圈的朋友却说实乃大谬，她本人明明就是一个爱笑的“小女孩”。

影视圈与时尚圈之泾渭分明，以杜鹃为交叉点，倒是可以由此窥见一二。对同一人物的观照，影视文化所代表的大众品味，与时尚圈所代表的潮流审美，有时候可说是南辕北辙，不仅不在同一个频道，甚至不像在同一个时代，实在是你不知我，我不知你。比如影视剧里的时尚题材，多被吐槽严重落伍，土到掉

渣，宋佳拍的那部以时尚杂志社为背景的《盛装》，只让人记住唱衰行业的那句台词，“整个纸媒行业穷途末路！”八年过去了，时尚媒体依然维持着体面，虽然行业盛典、慈善晚宴多成昨日云烟，但“金九银十”的封面人选时不时还在牵动人心。

我们也不禁要问，本土为什么没有像样的时尚剧？时尚女魔头的故事，讲了又讲，仿佛每本杂志每个时代的新老交替都如宫斗般惨烈，却也吸引无数年轻人继续投身这烈火烹油般的行业。从《穿普拉达的女王》到2019年的剧集《意大利制造》，既讲媒体老将不许人间见白头，不肯退出舞台，又讲新人要出头，顺便夹带丑小鸭变公主等职场励志元素，从故事人设到情节走向，大抵相似，说明基本概括这一行业的运行法则与风格作派，也备受观众认可。只是这样的故事不太本土化，一则本土行业剧里的职场大多形同虚设，二则本土时尚圈的新闻总是不按常理出牌，可能，比电影还精彩。比如近期《Vogue》杂志的最年轻主编章凝宣布离职，是时尚圈开年的头号新闻，华裔网红女孩一朝晋身主编，本该是这个时代才有的传奇，但上任三年宣布离场，剧情起落之动荡莫测，离你我熟知的那些

剧本设定实在相去甚远。

好巧不巧，杜鹃也在这一历史性的微妙节点上屡次现身。去年她被撤下杂志封面，一时轰动，理由是“违反排他协议”；今年由章凝亲自掌镜她的封面，似是弥补去年无心之过，但成片效果又惹来热议，反而在《繁花》中如鱼得水，继续白月光。加上去年全球编辑总监安娜·温图尔安娜来中国参加的那场活动，因为今昔对比反差太大，也是话题不断，如此几次三番，越发显得这世界大像一个草台班子，《一代宗师》里丁连山的活就在耳边：面子可不能沾一点儿灰——面子里子该如何维持平衡，实在是门大学问。

本土时尚故事到底该怎么拍，其实洪晃在电影《无穷动》里已经示范过一次，就像她如今在播客里那样，直接开麦。当年吴彦祖第一次当导演拍电影《四大天王》也是这样，拿着摄像机直接杀进娱乐圈现场开怼。非如此不可，既然草台班子都在摆烂，除了向它们宣战别无他路。所以，这次这个摄像机，又该交给谁？

长风新
媒体人

上海文艺评论
专项基金

特约刊登